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野下的陈云文化思想研究

李 宁¹, 龙 飞²

(1.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8; 2.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8)

摘 要:作为政治家的陈云, 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 又由于其独特的生活经历, 使其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理论框架下兼具一定的典型性意义。陈云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化观的形成, 显示出其文化思想的支配性意识依然是政治要求, 但蕴含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发展路径的极为宝贵的探索。建国后陈云对苏州评弹和整理古籍的冷静沉思以及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 反映了他在文化发展需要与政治要求之间进行的辩证考量, 尤其是其文化思想中所揭示的文化和政治共生发展的问题, 对于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以及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乏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苏州评弹; 古籍整理; 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3)01-0007-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中共逐渐形成的意识形态话语, 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对此都有过不少论述, 主要是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 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分析各地的不同特点及其变动”, “要有原则性, 还要有具体性, 要根据各地的情况来实现我们的原则,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2]因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开始主要强调的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理解并应用马克思主义, 成为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有力理论武器, 也蕴含着中共在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以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诉求。陈云长期担任中共党内的主要领导职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对他有重要影响, 不管是在他主管的经济工作, 还是在他其他领域, 随着时代的变化, 陈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水平也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

其实, 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都会遇到中国的具体历史文化情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中国化”不在于你愿意不愿意, 应该不应该, 只要是在中国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其背景条件、文化传统、语言特点、实践基础、成果形态等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中国化”

的烙印。^[3]陈云是上海青浦人, 儿时就经常去书场听评弹, 评弹成为他终生的爱好, 对评弹以及评弹以外的其他传统文化成果, 陈云也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这些看法和思想与其说是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和体现, 毋宁说和陈云成长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倾向有着天然的联系。研读陈云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以及对教育及知识分子的关注, 浸透着陈云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自然热爱以及在新的时代环境中遵循文化发展规律, 对文化建设和政治发展进步进行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系统梳理和反思陈云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服务于政治”的革命“文化观”的形成, 建国后对苏州评弹和整理古籍两个方面的文化发展需要与政治要求之间的辩证考量, 以及 80 年代以后对“文化人”的多方面关注, 虽然从总体来看, 作为政治家的陈云, 其文化思想的支配性意识依然是政治要求, 但却蕴含着陈云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发展规律的极为宝贵的政治性探索, 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整个文化发展的冷静沉思, 其中不乏一些独立性思考和真知灼见。陈云对于文化问题的思考, 尤其是其中所揭示的实现文化和政治共生发展的时代课题, 对于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以及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乏重要的理论

收稿日期: 2012-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KS007)

作者简介: 李宁(1977—), 女, 河南周口人, 副教授, 博士, 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陈云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服务于政治”的文化观

陈云青少年时期没能受过多少学校教育,1919年高小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商务印书馆是一个文化浓厚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陈云逐渐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在革命运动中,陈云十分重视并自觉加强革命理论学习,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等书。陈云特别强调学习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陈云在多篇中都指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4]143},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4]142}他一直坚持利用各种机会对马列主义的相关书籍进行系统的学习,通过学习来补充自己。

延安时期,陈云响应毛泽东的学习号召,在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六人学习小组,从1938年起坚持了五年,他自任组长,带领他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以及《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联共党史》等书。在学习的过程中,陈云指出,“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4]143}“必须彻底无保留地打破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和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概念,从具体的中国情况出发,抓住中国的特点”^{[4]235},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要审慎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4]29}这是陈云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进行的初步思考和总结。后来,陈云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说,延安时期,他就对“实事求是”有着深入的体会,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5]371-372}这是陈云对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较为全面的概括,“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5]372}这些思想得益于延安时期陈云对马恩原著

的认真研读。

在早年的学习和革命工作中,陈云不断地吸收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但由于当时所处时代的限制,他对无产阶级文化以外的内容吸收很少,特殊的革命时代环境造就了陈云早年对待外来文化,即主要是围绕马恩列斯思想和理论进行学习。当然,20世纪三十四年代,陈云也学习和聆听了德国古典哲学、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及时空、现象与本质、认识论、逻辑史、反映论、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及宗教、孙中山哲学思想等课程,也学中国历史、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6]但总体上讲,一切文化的学习都是紧紧围绕党的革命斗争而开展的,文化和政治的主次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事情,有些场合二者的界限也是非常清晰的,诸如“文化人”和“党员”的提法。1939年,陈云指出:“文化与政治是密切相联的。如果没有文化的提高,要提高政治水平是不可能的”,“没有相当的文化程度,要学懂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4]179}“马克思主义”是提高“文化”的旨归是显而易见的。1942年11月,陈云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类似的认识:“文化低的,要尽心尽力学文化。政治是重要的,我们共产党就是搞政治的,但是搞政治要有一个基础”,“如果连字还认识不多,许多基本知识都不知道,怎么去学?所以,要搞通政治,就先要提高文化;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学懂政治”。^{[4]265-266}1943年3月,陈云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比如怎么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那种以为作家可以不学习政治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要服从于政治、服务于群众的意见。”^{[4]277}

二、陈云的传统文化观： 传统本位与政治要求的结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关。从江南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陈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主要源于对评弹艺术以及四库全书的关注,并进而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提出了很多指导,体现出其日臻成熟的文化思考。

评弹是中国的民族艺术,对于评弹艺术,陈云曾说过,“只是他的业余爱好,随便谈谈的”,^{[7]1328}但总是做事认真、用心思考的陈云对评弹艺术的精深了解,不仅仅是欣赏和爱好,而是从1959年起,先后发表了近40篇“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针对评弹艺术的现状和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陈云对评弹的历史十分重视,“要研究评弹的历史。对抗战前后这一段评弹的历史也要研究。不研究这段历史,就不能了解评弹发展的全过程。”^{[8]62}对于评弹中所涉及的地理和历史方面的知识,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防止反历史主义的错误”,^{[8]9}要求相关人士对其进行考查。针对新书的创作和改编,陈云在鼓励艺人创新的同时,也提醒艺人注意实事求是,不能有常识性的问题出现。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7]1340}他以《玉蜻蜓》为例指导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不能离开时代条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7]1338}

评弹是民间艺术,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娱乐性。陈云认为,“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8]81}陈云始终强调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不能只强调政治内容,他针对当时忽视文艺的娱乐作用的“左”的偏向指出:“在目前的曲艺创作和演出中,强调了政治内容的一面,忽略了文化娱乐的一面,这是偏向。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人们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这不是听报告受政治教育所能代替的。”^{[8]45}他指出:“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8]51}

陈云也曾提出要加强评弹艺术的管理,因为“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就是好的”,“过去,节目太政治化了,所以现在要轻松一点,但不是把什么都搬出来”。^{[8]69-70}20世纪80年代,陈云仍然指出,要“坚决抵制迎合部分听众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的商品化和自由化的有害倾向,“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5]287}并进一步提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主张,要建设一支艺术高超、思想健康的评弹艺术队伍,为发展和振兴评弹艺术指明了正确方向。

陈云对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也源于他青年时期在商务印书馆时对图书典籍的热爱。“文革”之前,古籍整理也曾得到重视,但“文革”中,许多古籍和文物被毁弃,古籍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后,陈云十分关心古籍整理工作。陈云认为,“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才行”。^{[5]289}陈云十分重视整理古籍工作,对这项工作考虑得不仅细致,而且十分长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希望现在就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规划搞出来,把措施

落实下来。”^{[5]291}

陈云对古籍整理的想法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古籍进行“今译”,符合时代要求,让更多的年轻人阅读;组织一个几十年连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稳定的核心力量,有计划开展;把古籍整理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相结合;有力的经济支持,为整理古籍的专门人才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经过陈云的努力,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了陈云的意见,下发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专家学者群情振奋,武汉大学黄焯教授甚至“要向陈云同志行九叩之礼”。^{[7]1754}

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是个事关民族兴旺发达的大问题。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作为民族延续、再生、发展的根基和向心力而存在的。陈云的文化思想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批判性地继承,符合了文化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振兴。

陈云的上述思想和做法集中反映了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和发展传统文化,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努力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甚至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仍保持着对文化发展问题的一份理性思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陈云文化思想的核心：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是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陈云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论述,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的性质、作用,为中共进一步制定一系列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指导思想,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

早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陈云就曾指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他也是学生出身”。^{[4]180}陈云以史为鉴,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他回顾了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指出:“有些同志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们不加分析,笼统地说知识分子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说,知识分子有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4]180}

建国后,陈云在负责经济工作的过程中,特别重

视尊重知识分子。他指出：“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5]296}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面，陈云促进了相关政策的完善。邓小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于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9]

在陈云看来，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解决他们的问题，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是国家建设的重点之一。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陈云对知识分子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并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常委，指出“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5]312-313}此后，陈云还直接督促有关部门采取有力的具体措施，把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作为党和国家当前的重点，“什么是重点？现在看，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5]323}

教育事业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发展教育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1981年，在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时，陈云提出：“在科学和教育部分，应加强常规教育、提高整个国民教育水平、提高技术基础和在科学技术上组织攻关的内容”。^{[10]1761}1982年，他在会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时，明确提出：为顺利实现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在“六五”和“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

的。”^{[5]319}

教师的培养以及他们的生活待遇是教育的重要着眼点。1984年9月4日，陈云看了9月2日《人民日报》上山东益都二中刘沂生写的《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了解到目前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第一志愿的情况，委托秘书转告邓力群说：“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的各方面，影响都很大。同时，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住房问题，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10]1762-1763}

教育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力量。知识分子拥有其他社会阶层无法具有的特点，他们在文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是文化建设的载体，陈云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足够重视对于文化建设的进步提供了基本保证。

四、小结：走向文化与政治的共生

作为一个在经济领域有所成就的中共领导人，陈云的文化思想也许显得有些单薄，但陈云的文化思想，同样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典型素材，让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路径。这个素材有着与其他中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比如，革命时期的文化思想或建设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性”特点，这几乎成为革命时期革命者们的“文化共识”，这一特点甚至在陈云等一些领导人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同时，这个个案也有着明显的“个性”特点，建国初期陈云的文化思考更多地来源于他生活过的文化场景留下的历史记忆，而对这些历史文化记忆的现实思考又发生在南方“疗养”期间，由此来看，这一时期陈云的文化思想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甚至也许只是一种“偶然性”发生。但不管如何，陈云对评弹的看法和对古籍整理的想法和思考，更加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的冷静沉思。20世纪80年代以后，陈云对文化的核心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教师待遇的重视以及采取的各种积极措施，为近三十年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绝不是那种“书斋里的革命”或无聊的文字游戏，马克思主义自身也绝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而是集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于一身的真理系统。^[1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离不开在“中国语境”下对马

克思主义进行的理论诠释和实践操作。梳理陈云文化思想的三个层面,无疑,它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和路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究竟如何?“文化”与“政治”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在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语境中,它们有时以各自“独立”的身份若即若离,顷刻间,文化又可能丧失了其“独立”的身份,以“政治”为中心被构建起来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文化体系”。在和平的时代环境下,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又总是离不开政治条件的保障,何时,文化的“独立”身份,或者是人们对于文化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够不依据“领导人”的影响而在社会上发出有力的回响呢?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中说,“只有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求得政治上的更加进步”。^{[4]143}这句话的提出在当时有一定的语境,但现在想来,仍意犹未尽。

参考文献:

[1]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 北

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

[2] 张闻天. 张闻天文集[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454.

[3] 林默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释义:一种解释学的视界[J]. 东南学术,2003(1):100-108.

[4] 陈云. 陈云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陈云. 陈云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传: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15,317.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传: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8] 陈云.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M]. 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3.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6.

[10] 朱佳木. 陈云年谱:下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1] 朱荣英.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理层级与功能期待[J]. 唯实,2011(8):51-55.

世界水日简介

2013年3月22日是第21届“世界水日”,3月22—28日是第26届“中国水周”。联合国确定2013年“世界水日”的宣传主题是“水合作”。水利部确定我国纪念2013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的宣传主题是“节约保护水资源,大力建设生态文明”。为了缓解世界范围内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根据联合国《21世纪行动议程》第18章有关水资源保护、开发、管理的原则,1993年1月18日,联合国第17次大会通过了193号决议,决定从1993年开始,确定每年的3月22日为“世界水日”。决议提请各国政府根据国情,在这一天开展具体的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节水意识。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后,为增强全民的水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自觉地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各种水事活动,中国水利部从1989年开始,确定每年7月1日至7日为“水法宣传周”。自1993年“世界水日”诞生后,考虑到“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的主旨和内容基本相同,因此从1994年开始,把“中国水周”的时间改为每年的3月22日至28日,时间的重合,使宣传活动更加突出“世界水日”的主题。

水是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重要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虽然地球的储水量是很丰富的,但是其中海水却占了世界储水量的97.5%,陆地淡水仅占2.5%,与人类生活最密切的江河、淡水湖和浅层地下水等淡水,又仅占淡水储量的0.26%。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数量极有限的淡水,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污染。

据科学界估计,全世界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缺乏饮用水,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目前已有17亿人喝不上清洁水。我国人均淡水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属于缺水国家,全国已有三分之二的城市不同程度缺水。

以上数据充分说明:水资源短缺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前不久,联合国的人类环境和世界水会议已发出警告:人类在石油危机之后,下一个危机就是水。因此,保护和更有效合理利用水资源,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水是生命的基础,它不仅关系到人类生活的质量,还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我们必须增强水的危机意识,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资源。

(摘自中国水利学会网、新华网)